

我们以“生活”一词想说明什么，能说明什么 ——对第一天诸发表的点评

田村 和彦
TAMURA Kazuhiko
翻译：宗晓莲

1. “生活”的前景：以1900年前后出版的汉英辞典/英汉辞典为例

“生活的变化”和“生活改善”是日本民俗学会主办的本次“没被在意的日常/不断变化的日常”国际研讨会的研讨主题，也是主题演讲，问题设定，以及今天各发表的共同关键词。这里所使用的“生活”一词，有着怎样的内涵，民俗学积极使用这一概念可能开拓什么样的可能性？为了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对今天各位的发表作一粗浅的评述，笔者打算以有点绕弯的方式，从简单整理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的变化过程开始，笔者认为这样可以更清晰地凸现诸发表以及本次研讨会的特点¹。

岩本已经指出了在日本“生活”一词的来源，变迁，以及此后对其内涵进行的有目的的变更。在中国，该词即使在近现代也并不包含今天我们马上能联想到的内容（岩本 2009，2011）。笔者打算从整理这一差异出发，开始今天的述评。

首先让我们从将汉语翻译为其他语言开始变得非常必要的1900年前后的汉英/英汉辞典着手，考察这一问题。

根据1892年发行的著名《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其编者是后来成为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学教授的Herbert Allen Giles，汉语的“生”有着to bear; to bring forth; to produce; to beget; to be born等含义，在这一意义上与“灭”“没”，及“死”“克”等词形成反义词。另外，“生”还有着raw, fresh; barbarous; unfamiliar, unacquainted with等含义，在这一意义上与“熟”形成反义词。此外，作为to be alive; living; life之意也通常使用，列举的具体事例有“生理，生活，生业，生涯”等词，其对应的英语则列举了occupation及livelihood等词，特别是作为“生活”之意时，也有to make a living的含义（Giles 1892（1912））²。该辞典在指出该词有着我们今天所用之意相近的含义的同时，从总体上来说，“为了生存的手段”的语感很强。

对近现代中国出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的美华书馆（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5年发行了P.Poletti所著的《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该辞典以对一个个汉字进行解释说明为中心，基本上没有列举成语或惯用语的例子。其对“生”的解释是to produce; to bear; life; unripe; new; unpolished; raw; to arise, to grow; to beget，能够让我们联想到今天的“生活”一词的life（这也有可能是因为此前后出版的其他辞典的例文中，列举了“活着”一意）只是多项内含中的一项而已，在“生”所包含的多项含义中，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含义（Poletti 1905）。

上述辞典主要是欧美人用以参考的，下面来看看中国学者翻译的辞典。1929年出版的《A Complet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是由O.Z.Tsang（张鹏云）编纂的汉英辞典，张鹏云当

时在以有着“中国的哈佛大学”之称而著名，教会系大学之首，培养了众多知识分子的St. John's University任专职翻译教师。他所编纂的这一辞典中，“生活”一项被解释为“生活or生计or生涯”，其对应的英文则是living; livelihood; way of life; occupation (Tsang 1929)。乍看之下似乎包含了今天的“生活”一词相近的解释，然而如果用可以置换的词语进一步思考该词的含义，那么在“活着”，“生存”之外，“活下去的技能”，或者是作为其具体表现的职业才是该词的主要内含。该辞典中出现了“生活程度：the standard of living”，这一今天也使用的扩大了“生活”概念，然而从把biodynamics翻译为“生活机能学”可以看出，依然强调的是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的“生活”，也就是说作为说明“活的”“活着”样子的概念。

下面让我们反过来看看，可能翻译为今天的“生活”一词的来自于英语的概念又是如何汉语化的，并看看相关事例。

上文中提到在解释“生活”一词中，有可以认为是与今天用法相近的life及living，在1905年出版《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of Translation》中，是如此说明的(Hemeling 1916)：

Life被译为“性命，生，生命，命，活命，活着的时间，终身，一生，一辈子”，manner of living的翻译则有“过日子的方式，行为，举动，品性，世路，生平遭遇，力，气力，精力”。正如high life被译为“高等生活”；“生活，生机，生气”的对应词汇则是animation。在这一个项目中，与今天的“生活”一词最相近的译语应该是not a daily necessity of life的翻译“非民生日用所必需”的“民生”³。另外，作为standard of living的翻译语，使用的是“生活程度，生事程准，国民生计等级”等词语。有关这一翻译的学术背景，下文将论及陶孟和等人的研究。

相关词语也有着相似的翻译，livehood有“养廉，赡养，营生，生活之计，生计，养生之计，生涯”等词语与之相当，to get a livelihood被解释为“过日子，度日，糊口，生活，营生”，与其相似，living alive被解释为“活的，活着，活，生活”，living (livelihood)的含义则有“养廉，营生，生活之计，养生之计，生计，生涯”等。

该辞典也同样大致将“生活”解释为说明活着的状况，是与当时的“生理”及“生涯”同样范畴的词语，作为为了生存下去的收入，职业，及相关技术等含义而被使用的。

接着让我们以近年编纂的古语辞典为依据，验证一下1900年前后编纂的英语/汉语辞典中所收录的“生活”一词的内涵与今天该词的不一致之处。根据对古代汉语词汇进行解说的《现代汉语词典》，“生活”一词的含义有“工作，活计”及“物件，物品”，关于前者，列举了《独角牛》和《金瓶梅词话》中的用法，两者都是有关生计，生业的事例(许(主编) 1997)。以类似目的编纂的《汉字古今意合解字典》中，有关“生”的字义有“①成出，生长，②人的出生，生育，③产生，发生，④活着，生存，⑤生产，⑥生计，生活，⑦生命，⑧一生，终生”，第6个含义有“生活”，然而是与“生计”属于同一范畴的(许，陈 2002)。作为第7个含义的解说，该字典列举了《捕蛇者说》一文中“而乡隣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号呼而转徙，饑渴而顿踣”，句中的“生”为例来说明。然而如果论及今天“生活”一词的内涵，笔者则认为同文后半句“故为之说，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中的“人风”更为相近。

上文以1900年前后编纂的英汉辞典和有关汉语古词语的辞典为依据进行了简单的考证，可以看出当时“生活”一词的含义与今天有差异。至少可以说，是作为与《The Oxford Chinese Dictionary》(2010)记述的以“生活”开头的18个翻译词语(例如生活必需品daily necessities，生活方式way of life，生活条件living conditions，生活作风conduct等)很不同的含义被使用的。笔者认为这一问题非常重要，然而即使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外来语研究中极为著名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高等 1958)一书，也忽略了该词。有可能是因为就在我们身边的“生活”过于理所当然，从而使得“生活”一词遭遇了这样的待遇。然而，这一点也正是笔者今天点评的立脚点。也就是说，我们是如何令此

概念发生变迁,某种意义上对此进行探索的,又是将什么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的,对“生活”概念过于理所当然的接受,正印证了对这些问题进行再检讨的必要性。不过在经过以上的考证后,先让我们来看看“生活”概念用法的扩张,变迁是如何发生的。

2. “生活”概念的变迁

作为了解“生活”概念扩张,变迁的路径,这里以哈佛-燕京研究所所藏书的一本整理了中华民国时期书籍的资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时期图书总目》(龍 2010)为依据。

该书中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关系很深的“社会科学类”中记载的书籍中,含有“生活”一词的著作有33本。如果按照时间顺序对此进行排列,可以看出很有意思的倾向。

最早的1928年出版的《马来半岛土人的生活》,《中国妇女生活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与今天的“生活”部分含义相近的用法。然而这样的用法很快消失,从1930年至1932年,《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等书出版。这一变化倾向应该与后文将述及的陶孟和等人著作的出版有关。这一时期使用的“生活”一词,受到欧美理论,社会实践的影响,“生活”原本内含的与“生计”之意相近,同时在数量上可以把握的一面被强调。然而,1934年国民政府开始强调新生活运动后,“社会科学类”中所有包含了“生活”一词的书籍都转变为与该政治运动相关的内容,这一倾向一直持续到1939年。这一运动受到了日本的“生活”概念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这一时期出版了,《农民的新生活》,《儿童的新生活》,《妇女的新生活》,《文艺家的新生活》等等,所有人都试图参与这一作为政治运动的新生活运动的样子可以想象。上述书籍的出版社是南京正中书局,再从著者或编者的履历来看,这里使用的“生活”一词正是新生活运动的生活概念,而不可能是其他含义。

同研究所藏书中,书名打头使用“生活”一词的,以1928年出版的生物学教科书《生活进化史ABC》为开端,1934年陶行知校订的《生活的书》(汪達之著)等作为社会运动,同时也是作为知识与实践相融合的重要书籍也出版了。然而,与新生活运动时期“社会科学类”书籍中包含“生活”一词的书籍急增不同,之后到1940年为止,总体出版量不多。到了40年代,1941年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翻译出版(原著为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1937),阪本胜翻译为日语时,译为《生活の发现》(1952),现在的日语版标题为《人生いかに生きるか》)。从这一时期起,如何度过理想的人生的指南类书籍开始增多。燕京研究所藏书目录可以看到的林语堂的该书中文版是由黄嘉德译,西风社出版的,几乎是同一时期不同译者的中文版也出现了。有趣的是,虽然译者不同,但是在品味推敲Art的翻译词时,由于位处同一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背景下,都采用了令人联想到周作人提倡的“生活之艺术”的《生活的艺术》这一译语。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生活”一词,是作为与“智慧”,“思想”,“体验”,“幸福”等连接的词语被普及的,此内含的深意可以推测为,上文1900年前后编纂的汉英辞典中的相关词语内涵的进一步发展,继续下去的“生存”,“生涯”更进一步扩展为“人生”,乃至如何以更理想的方式度过这一“人生”。以对林语堂产生过很大影响而闻名的民俗学者周作人早在1920年代就在这一意义上讨论了“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说,民俗学比其他学科更早地具有了将该词作为学科的关键概念进行深入探究的条件,然而却错过了这一机会,这样说也并不为过。

3. “生活”和“社会调查”——作为改善对象的“生活”

点评的预备工作的最后，笔者还打算探讨一下中华民国时期出现的具有了新内含的“生活”，与此进行调查的视角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社会学中，首次系统的社会调查是1914年实施的《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也就是说，社会学的最早研究就已经将“生活”确立为对象。这一调查以基督教会大学为中心，当时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学问而输入的社会学在大学相继开设，其指导者是社会学教员John S. Burgess，实施者是Student Social Service Club（社会实进会）。陶孟和参加了该调查，后来又留学英国，与梁宇皋一起采用了与当时英国社会学中很盛行的都市贫困层研究相叠合的方式，以中国农村和都市的“生活”为论题撰写了博士论文(Leong, Y, K& Tao, L. K《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1915),《中国的乡村与城镇生活》)。陶孟和归国后担任社会调查所的所长，参与了多次调查。这一作为调查对象的“生活”，很多情况下都是都市中新诞生的下层劳动者的收入与支出为中心的。具体来说，有陶孟和本人撰写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6)，同是社会调查所的杨西孟撰写的《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1930)，上海市社会局出版的由刘宝衡撰写的《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书》(1934)，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杨蔚撰写的《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1940)。这一关注“生活”的眼光，也影响了统管人们的各种组织，出现了如下的调查报告：《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统计报告书》(工商部 1929)，《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统计总报告》(工商部 1930)，袁昂，吴永成撰写的《中大工人生活调查》(1931年)，贾铭撰写的《铁路工人生活调查》(1933)等。近年，这些调查报告的一部分被再收编出版了(李文海等 2004)。

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学中，关注“生活”的，还有另一重要人物，Sidney Gamble。与Burgess一样，Gamble是通过基督教会大学向中国引入社会学的另一重要人物。在这里，可以看到同样的从某一特定视角进行的“生活”与“调查”的亲密关系(有关该时期在中国进行的社会学调查活动，閻 2004更为详细)。Gamble主要是组织了在北京的调查，作为Burgess的助手，在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Center和the Peking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的援助下进行了Peking: A Social Survey (Gamble 1921)，使用了恩格尔系数等当时的最新理论出版了《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孟天培，Gamble 1925, 1926年。平野正雄将此翻译到日文，《北京に於ける二十五箇年(自1900年至1924年)の物価・工資・生活程度》，1942年)，《Peking Wages》(1929)。有意思的是，Gamble的代表性著作《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 a study of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283 Chinese families receiving from \$8 to \$550 silver per month》，在中国或者被直译为《北平的家庭是怎么过活的》，或者被译为《北平的中国家庭是怎么生活的》，这正体现了不断变迁的“生活”概念的摇摆。该书于1940年由福武直翻译到日语《北京の支那家族生活》，虽然书的一部分包含了有关冠婚葬祭及衣装等的记述，然而主要内容则是正如副标题所示，是对北京的283户人家的收入，支出和储蓄的基于经济关心的调查分析，并不是今天的囊括一切的“生活”⁴。这里也体现了“生活”概念的摇摆性。

总而言之，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汉语中使用的“生活”概念的含义之一是，当时被视为社会“问题”的(这里可以回想起当时社会学研究主题之一是犯罪)，以都市为中心的社会下层劳动者们的经济状况的问题，正如当时流行的生活费调查，陶孟和与Gamble的调查报告所显示的，他们所关心的是今天应该称为“生计”的问题。而这一时期“生活”的一个侧面，正如在试图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调查形式的吴文藻所曾指出的，“社会调查本可以追溯到法国Frederic le Play在当时实地考察工人生活所作的许多家庭帐簿研究”(吴 1935)。中国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正是在此延长线上的。

这里讨论的“生活”概念与本次研讨会所论及的“生活”，虽然在有必要改善这一点上有一致之处，然而，在“生活”本身应如何把握方面还有很多不同之处。其最大理由是，上文述及的扩张了的“生活”概念，以在数量上可以把握的具体内容为对象，而今天诺发表所论及的有着一定共通关系的“生活”，可以说显示出的是对那些无法计量的对象的关心。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关心的是，在对过去的无数可能的应有状态进行有意识无意识地不断选择的同时，依然受到过去的影响；从与有着各种可能性的未来相联接，然而又必然转眼即逝的现在这一地平，我们以什么为对象，如何感觉/思考，并处理它们与自己的关系，对它们形成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其实就是面向的是“现在活着的”还是“过去活着的”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参照史料，同时将记忆，口述和身体技法等各种方法置于方法论的中心位置。总而言之，上文以中国的情况为案例，对“生活”这一乍看似似乎不言自明的概念，实际上在各个时期，随着各位论述者的关心不同，不断发生着变化，转换的情况进行了简要描述。简单概括地说，“生活”概念从“生存”，“活着”，演进到活下去的食粮，为了糊口的手段/职业。从这里一部分发展为以收入支出为中心的可以进行数值化计测的对象，另一部分则从活下去这一含义出发，发展为人生指导，以及过日子方法的启蒙等。此外，某一特定时期还出现府指导，介入人们的日常起居，礼仪，交际，以及新时代的时间和金钱使用方法等。如此这般，“生活”概念可以理解为不断变迁，摇摆，在某一时期形成的某种观点，看法。

4. 围绕“生活”的改善，向上运动： 行政的片段化，运动的主体，以及个人化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有关“生活”改善的运动，因此作为各位老师发表的共通内容，可列举以下相互有关系的几点：1) 由行政方面发起的运动带来“生活”的片断化，2) 运动的主体性，3) “生活”的个人化，这些关心点超越了对作为近过去现象的生活改善的相关研究，也是展望今后的民俗学时的重要问题点。

首先，从行政方面试图改善“生活”时，由于将具体对象问题化，也就是说由于有必要确认改善措施和改善成果，通常将“生活”片段化。正如田中老师在主题演讲中提及的，新生活运动时期所谓的“生活”改善，指的是具体的炉灶，厨房，浴室的改善，以及苍蝇，蚊子的驱除；南老师的发表也提到，虽然建设新农村运动包括生活的全部，然而也存在着住宅改良，修整下水沟，和设置共同堆肥场等几个典型的具体焦点。这些问题是改善“生活”，或者是过上“新的生活”时切切实实的必要措施，然而运动的具体对象不再是“生活”本身，也就是说，“生活”与具体对象之间是一种举喻关系。这样的对部分内容进行的“生活”改良，毫无疑问规定了当今我们的生活状态。然而，运动中被改良的这些片断和生活，不再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因为即使把改善的所有项目都合在一起也不能再建构今天我们所论及的“生活”。为了把握“生活”，不仅仅是列举这些被细分的片断化的项目，它还要求包括主观感觉在内的着眼关系性的意识转换。然而，正如上文对“生活”概念的回顾，检讨所显示的，这一概念本身是在以某一问题为对象进行探讨中，不断变化而来的，我们忘却或是忽略了这一点，从而没能将“生活”提炼为民俗学的重要概念。也正是这一思考空白，使得除了极少数研究之外（例如田中 2011等），民俗学对这一就在我们眼前展开，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运动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其结果是虽然对这一由行政体系发起的作为运动的“生活”改善活动进行了系列评论，然而没能充分发挥它可以不断唤起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有关总体性“生活”的讨论，研究的可能性。

上文确认了行政方面有关作为运动开展的“生活”的眼光，在现实的“生活”现场，总体性被分解，细分为具体的需要“改善”的项目而被实施。今天诺发表的第二个共通问题是有关运动的主体性问题。

正如南老师的论文尖锐指出的，着眼主体性，可以为理解目标是刷新“生活”的诸运动提供极为重要的观点⁵。

虽然诸位发表对主体性概念的注目程度有所不同，但是都有论及。例如田中老师在讲演指出，生活改善普及员发动地方上的年轻主妇们的力量，由住民们自己发现需要改善的问题，生活改善普及员（行政方面）只是完善解决问题的条件。通过这一采用协助，支援的方法，战后的新生活运动取得了比之前历次由政府主导进行的类似运动都更大的成果，这也反映的是主体性问题。小岛老师的发表中提及的通过行政记录《广报志》对运动的分析结果，与通过对运动的参加者为对象的narrative所显示出的差异；另外，南老师的发表中提及的新农村运动初期配发水泥的事例；周老师的论文中当政者对观光，体面，国民生活的提高等有关说法，与人们自身的都市生活体验等复杂作用下有关主体性的议论等，也是有着相同背景的。不过，山中老师的发表最为正面地论述了这一问题。山中老师以一直保持着交流关系然而不同的两个地方为事例，即使是同样的“没有蚊子和苍蝇”运动，由于对生活中的问题由“谁”，以什么样的方法解决的不同，此后的发展也完全不一样。把从这里可以推论的见解，与上文中总结出的将生活作为运动处理带来的生活片断化相联接，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行政主导的以运动形式展开的生活改善，参加主体作为程度不同的代理施行者参与活动，当片断化了的该项目得到改善，运动也就结束了；而由当地人发起，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为目的，以行动主体身份参加的生活改善活动会一直持续，没有完结之时。对于这一主体性的应有形式等问题，民俗学该如何提携合作？对于这一问题群，有必要超越具体的研究对象进行探讨，而作为本次研讨会主题的“生活”，由于其内含的涉及面之广（以及其内含的可变性），应该可以具有极强的召唤力。

今天除了周老师的论文，其他诸位的发表基本上论及的或是过去发生的对“生活”的改善活动，或者是创造“新生活”的运动。然而，现在诸如生活改善运动，新农村运动那样的席卷全体国民的大规模运动已经很少了，至少在日本，韩国，有关提高“生活”的努力呈现出委任给个人的倾向。如果确实如此，民俗学又该如何把握，分析这种个人化的提高生活的实践？

正如周老师的论文的厕所革命事例所显示的，即使是厕所这样乍看之下完全是个人现象的问题，也是在与其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专门设备的配备之类的条件，环境，以及技术等互相关联的复杂前提下才成为可能的。详细地考察这样的形成我们的生存环境的“世界”，找出内省的起点之类的方向性的探索是非常重要的。此时需要强调的是民俗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也就是通过narrative的方法了解被访谈者所认知的主观性事实，从他们的认知出发重新思考所考察的现象。通过这样的方法，可以得出与行政性的片断化后所理解的“生活”，以及上述的“调查者”与“被调查者”截然分开为潜在前提的“社会调查”所把握的“生活”不同的新见解。

另外，即使“生活”的继续构建已经成为个人的事，然而，所有的一切都依靠个人的创造性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不管是自上而下型，还是自下而上型，为了继续构建“生活”，就需要相关的模范，知识，经验，确保解释的回路。这样的个人化，并要求个体成为行动主体的同时，需要模范，知识，以及经验的状况，看来自相矛盾，然而这就要求人们的再次“联接”。在这里，为了更好的未来，或者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有必要解开变迁的关键点这样的从当今出发的需求，作为人们之间的连接点之一，过去的生活“感觉”经验所积累的成果，以及现在进行的田野调查的成果可以作为某种资源库进行活用。即使是以过去的运动为核心的资源库，由于它可以再次联接个人化了的人们的功能，也能对同一时代产生水平方向的影响。因为为了利用此资源库聚集而来的人们，是在现在这一时间点上活动的。不管是民俗学一直重视的面对面式关系，还是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的以SNS为代表的非面对面式关系，个人化了的人们为了提高自身生活的质量，作为伸长了的枝干上的一个核心，如果可以这样在有关“生活”的资料库中找到一个自身的位置，那么人们就不应是孤立的片断，而应在有着一定柔软性，可以变化的网络中被慢慢回收，同时也可能成为形成网络的一

个重要枝杈。可以说,对诸如此类从现在看来什么时候也有伸枝发芽可能性的知识和实践的连接点如何进行社会性的配置,显示了今后的民俗学应该怎样与社会相关联这一问题系的一个方向。

5 结语

上文对虽然时代,对象各不相同,然而都以“生活”及其改善为主题的诸发表中可能发现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最后确认以下几点来结束本次的点评。

本文指出各发表所共通的“生活”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是经历了历史性变迁而来的,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时代,不同知识背景下,人们出于什么目的使用此概念。很难说民俗学对“生活”概念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也很难说对有关“生”的提高,改善运动积累了充分的研究成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的诸发表提醒我们,需要通过面对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思考生活改善运动改变了什么,如何将人们席卷其中,并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一直没有重视,然而毫无疑问正是我们的“生活”立足点。如果是这样,那么对这一不断发生着变化,然而一直显示着其存在感的概念,今天的民俗学该如何把握?为此,又该如何展开有关此概念的研究?这是今天的民俗学需要回答的问题。

注释

- 1 本稿是日本民俗学会国际研讨会“没被在意的日常/不断变化的日常”的第一部“对象:生活变化与生活改善”的点评稿的修正稿。
- 2 当时汉语中的“生理”一词,有着与“职业”相近的含义。
- 3 研讨会上,也是当天发表者的周星老师指出,今天的汉语中,与“生活”一词相当的词汇应该是“民生”。特笔以示感谢。有关本文论及的在中国“生活”概念的变迁过程的更为详细的分析,包括受日本的影响,燕京大学田野调查实验区的成果等,都置于当时社会学的调查背景下的详细分析将在别稿中述及。
- 4 由于是翻译语的问题,福武的译书按照当时的原样。
- 5 研讨会的讨论中,伊藤亚人老师指出,在“生活”改善运动被论及,以及具体实施时,活动的主体通常都暧昧地不被正面地提及,因此被命令需要改善的对象都成了泛指的“人们”。在感谢伊藤老师的指摘的同时,笔者还想补充说明,这也正好可以与近年来中国民俗学一直讨论的问题系,也就是说,“民俗”的“民”究竟指的是谁的问题相衔接。

参考文献

- 岩本通弥 2009 「生活」から「民俗」へ—日本における民衆運動と民俗学」東国大学校文化学術院日本学研究所(編)『日本学』第29輯、東国大学校文化学術院日本学研究所
- 岩本通弥 2011 「家族をめぐる二つの生活改善運動 民力涵養運動と新生活運動」田中宣一(編著)『暮らしの革命:戦後農村運動の生活改善運動と新生活運動』、農山漁村文化協会
- 閻明 2004 『一門学科與一個時代:社会学在中国』、清華大学出版社
- 許威漢・陳秋祥(主編) 2002 『漢字古今義合解字典』、上海世紀出版社
- 許少峰(主編) 1997 『近代漢語詞典』、團結出版社

- 呉文藻 1935(1990) 「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趨勢」『呉文藻人類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 高名凱・劉正琰 1958 『現代漢語外来詞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
- 田中宣一 2011 「生活改善諸活動について」『暮らしの革命:戦後農村運動の生活改善運動と新生活運動』、農山漁村文化協会
- 孟天培・Gamble, S. D. 1925・1926 「二十五来北京之物価工資及生活程度」李景漢訳（平野正雄訳、1942『北京に於ける二十五箇年(自1900年至1924年)の物価・工資・生活程度』）
- 李文海ほか(編) 2004 『民国時期社会調査叢編・城市(劳工)生活卷』、福建教育出版社
- 龍向洋 2010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図書館蔵民国時期図書総目』、広西師範大学出版社
- 林語堂 1937(1952) 『生活の発見』、創元社（阪本勝訳、1952『人生をいかに生きるか』上下、講談社）、(原著：Yutang, Lin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New York, John Day)
- H. Giles, 1892(1912 second ed),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Revised & Enlarged, in Shanghai, London.
- K.Hemeling, 1916,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官 話> and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 O.Z.Tsang, 1929, “A Complet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Shanghai : The Republican Press.
- P.Poletti, 1905, “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S.D.Gamble, 1921, “Peking:A Social Survey”, New York : George H.Doran.
- S.D.Gamble, (field work in charge of Wang Ho-Chen and Liang Jen-ho), 1933, “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 a study of the income and expenditure of 283 Chinese families receiving from \$8 to \$550 silver per month”, New York : Funk & Wagnalls. (福武直訳、1940『北京の支那家族生活』、生活出版社)